

## 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

余敏玲\*\*

本文以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Ostrovskii)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Pavel/Paul Korchagin)為焦點，探討他以革命英雄典型的身份，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中與社會文化裡所扮演的角色。本文主要處理的時段是從中共建國到文革結束。保爾·柯察金在小說中展現出蘇聯內戰時期與敵人鬥爭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對黨的忠貞，是史大林政權所要提倡的英雄榜樣。這樣的精神也正是他被引進中國的主要原因。

對毛澤東而言，革命不只是政權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一場從根做起的社會改造。因此，毛取得大陸政權之後，亟欲擺脫過去所謂舊的資產階級文化、上層菁英文化，亟欲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大眾文化。如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建立新的人生觀，成為當務之急。保爾的英雄形象與特質，正好為這種新的大眾文化提供典範，作為教育新人的榜樣。自中共建國以來，有關當局大量譯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並透過電影、話劇、教科書、成立保爾班等各種管道，宣揚保爾精神，加上共青團的配合，期望將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塑造成「社會主義新人」。

但是保爾精神的內涵，也由於政治環境的改變，官方所強調的重點時有不同：從韓戰的愛國精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不畏艱辛、到文革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並且民間的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一定完全隨著中共官方的指揮棒起舞。一般而言，到

---

\*本文撰寫與修改期間，承蒙汪朝光、翟志成、沈松僑、陳永發、羅久蓉諸位先生，提供許多寶貴資料與意見，在此特別表達由衷謝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官方與民間對保爾精神的解讀有很大程度的交集。而解讀的最大歧異則在保爾與他初戀情人的愛情。從官方、民間解讀之異同，可以看出文化生產者（國家）與文化消費者（社會大眾）是種協商關係，不是截然二分，並非國家在控制一切，而民間只有消極被動的接受；反之亦然。換言之，這整個文化生產其實是種多元參與的過程，不管民間與官方對保爾精神解讀的異與同，都已經是這整個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說其中只有菁英（或製造者）才是主角。這個案例展現了法蘭克福學派與 John Fiske 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呈現兩極的詮釋，並不足以反映歷史實情。

關鍵詞：英雄塑造 保爾精神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中共政治文化 大眾文化

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回憶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痛悔，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sup>1</sup>

曾經有無數中國人將這段名言，或寫在日記，或掛在床前，或貼在牆上，或放在案頭，或背誦在心，當作人生座右銘，用來鞭策、勉勵自己。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Nikolai Alekseevich Ostrovskii, 1904-1936)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曾經陪伴數代中國人走過他們的青春歲月，也深深地影響過他們的人生觀。本文擬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

<sup>1</sup>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第1版，1995年第5版，2000年第8刷），頁278。

這部小說的主人翁保爾·柯察金(Pavel Korchagin)<sup>2</sup>為焦點，探討他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運動中與社會文化裡所扮演的角色。中共官方如何試圖將這部小說的英雄典型，賦予政治使命，期望達到改造人民的目的。在這過程中，所謂保爾精神的內容，隨著政治環境的改變，被強調的重點又有什麼不同？

眾所周知，中共建國初期，所有的政策，都是向蘇聯一面倒，文化政策自然也不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第五天，中蘇友好協會亦隨之成立，總會長劉少奇致詞道：「中國革命在過去就是學蘇聯，以俄為師；今後建國，同樣是要以俄為師。」<sup>3</sup>這樣的決策與當時中國大陸的內在、外在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在一方面，中共要去除資產階級「舊」社會的種種餘毒，迎接共產主義「新」社會的來臨，當時唯一可以借鑑，有此經驗的現成範例只有蘇聯。另一方面，早在國共內戰接近尾聲，中共勝利已是指日可待之時，毛澤東即已提出中共要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他認為基於過去的革命經驗，必須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選擇一邊；沒有虛偽的第三條路可走。美國介入中國內戰，支持蔣介石的國民黨，但是國民黨最後仍被中共打敗，這意味著美國帝國主義對華侵略政策的失敗。中國人民必須團結一致，保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作長期鬥爭的決心，這樣才能徹底瓦解帝國主義在華勢力。中國在國際上屬於以蘇聯為首的反帝國主義的一方。蘇聯共產黨是最好的老師，所以必須向聯共學習。<sup>4</sup>因此，當時

<sup>2</sup>按俄文的音譯，應該是帕維爾·科爾恰金。俄文名字 Pavel 即英文的 Paul。現在人們熟知的保爾·柯察金，乃是從英譯本而來。

<sup>3</sup>〈中蘇友好協會成立大會上 劉少奇會長報告全文〉，《人民日報》，1949年10月8日，第1版。

<sup>4</sup>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丟掉幻想，準備

的中國大陸，除了與蘇聯及其東歐附庸國交好之外，在國際外交上實處於孤立地位。不管是基於意識形態或是現實環境的考慮，全面地以俄為師，成了中共唯一出路。

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國大陸有個十分流行的口號：「蘇聯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以俄為師，幾乎成了政府推行的全民運動。在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蘇聯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時，難免出現一些誇大的現象。例如一位四川中學教員說：「蘇聯有一秒鐘飛千多里的飛機。有長生不老藥。」有些農村宣傳員誇耀蘇聯農民加入集體農場後，生活獲得巨大改善，甚至說「蘇聯的豬每天吃水餃。」<sup>5</sup>

對毛澤東而言，革命不只是政權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一場從根做起的社會改造。革命不但要改變政治、社會組織，連風俗習慣、道德、思想、行為模式、價值觀念等都應該隨之改變。他所期望的社會改造頗類似於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所提的掌握文化霸權。因此，毛取得大陸政權之後，亟欲擺脫過去所謂舊的封建文化、庸俗的商業流行文化、資產階級文化、上層菁英文化，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文化、新的大眾文化。如何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建立新的人生觀，成為當務之急。保爾的英雄形象與特質，正好為這種新的大眾文化提供典範，作為教育新人的榜樣。

雖然目前關於大眾文化的研究，絕大多數是以資本主義社會，而不是共產主義社會為對象。但兩者目標雖異（前者為商業利潤與娛樂；後

---

鬥爭（1949年8月14日）；〈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竹內實編，《毛澤東集》（東京：蒼蒼社，1983），第10冊，頁296-306、317-332。

<sup>5</sup>新華通訊社編，〈應該改進中蘇友好的宣傳工作〉，《內部參考》，1952年12月27日，頁386。

者為宣傳與教育，以便維持其統治地位），文化製造過程卻相同（由技術人員或統治階級製造產品，而不是個別藝術家或大眾本身）。<sup>6</sup>即從物品或意識形態的被生產、傳播、消費過程是一樣的。因此大眾文化中的生產者與消費者關係的探討，運用在共產主義社會仍有可借鏡之處。筆者不擬在此對大眾文化的理論研究，多費筆墨，因為這不是本文要處理的重點。僅在此對大眾文化做一簡單說明。有學者將流行文化等同於大眾文化，兩者交換使用，不加區分。<sup>7</sup>也有學者認為兩者內容雖有重疊，卻也有分野。他們認為中國的流行文化有兩種。一種是較輕鬆、較普遍，較接近傳統文學的流行文化，可以鴛鴦蝴蝶派為代表。另一種是具有嚴肅意識形態的流行文化——尋求以「人民」重新界定國族(nation)，以便實行群眾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準。五四、延安時期所要創造的流行文化便屬於後一類。這種流行文化與大眾文化有交集的部分。但也有不同之處，即流行文化可能是民間團體發動的，而大眾文化指的是全國性的，不分階級，由上層有意識的發動與控制的文化。<sup>8</sup>這也正是中共所追求的大眾文化，其在文學上的表現方式，就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無可否認地，將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當作文藝創

---

<sup>6</sup>Dwight Macdonald,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John Storey ed.,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 Reader*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4) pp. 30-31.

<sup>7</sup>如 Herbert J. Gans, *Popular Culture and High Culture: An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f Tast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4); Dwight Macdonald, "A Theory of Mass Culture," p. 29。

<sup>8</sup>Leo Ou-fen Lee & Andrew J. Nathan, "The Beginning of Mass Culture: Journalism and Fiction in the Late Ch'ing and Beyond," in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 Evelyn Rawski eds.,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p. 388, 360.

作的最高指導原則，對於藝術創作確實是一大束縛與斷傷。但是誠如 James von Geldern 所言，社會主義寫實主義最大貢獻之一是將過去分離的菁英小眾文化與庸俗大眾文化合而為一，創造出一種屬於全體人民的文化。亦即共產政權試圖將文化導向群眾，生產一種群眾也能瞭解的全民文化。<sup>9</sup>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以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經典之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為塑造大眾文化的工具，再適合不過了。如果將中共官方當作大眾文化的生產者，保爾·柯察金的英雄典型視為一種產品，那麼官方如何宣傳與促銷這項產品？做為消費者的老百姓，又如何接受這個「產品」？他們是否一如法蘭克福學派所強調，大眾只能完全被動地接受由上而下的社會權威或官方所要灌輸的那一套，完全沒有自主性？<sup>10</sup>還是民間有自己的解讀，甚至如 John Fiske 強調的大眾主體性，即大眾的積極參與是這個文化塑造過程中最重要的因素？<sup>11</sup>

必須一提的是，本文主要處理的時段是從中共建國到文革結束。一九九〇年代的中國大陸，再度掀起「煉鋼熱」。但是此時的市場經濟已經在各主要城市與沿海相當深化，社會與價值觀的急遽變遷，使得中共當局雖然仍高舉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旗幟，大陸其實已是一資本主義社會。大眾傳播媒體在這整個文化塑造過程中，扮演了更重要

---

<sup>9</sup>James von Geldern, "Introduction," in James von Geldern & Richard Stites eds., *Mass Culture in Soviet Russia*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xviii.

<sup>10</sup>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3), pp. 100-110.

<sup>11</sup>John Storey, *An Introductory Guide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pp. 184-188.

的角色。因此保爾精神在九〇年代的討論，實則已構成另一論述，若要詳論，必須另文處理。為比較與分析起見，本文僅能作一簡潔的勾勒。再者，由於有關農村資料的匱乏，本文所處理的大眾文化主要以城市為主。

## 一、保爾的誕生與蘇聯官方的解讀

保爾·柯察金是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筆下的英雄人物。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奧斯特洛夫斯基出生在烏克蘭一個酒廠工人家庭，後來定居於謝比托夫卡(Shchetovka)鎮。他因同情紅軍，加入內戰。一九一九年加入共青團。數次戰鬥使他的腹部和頭部受了重傷，並在十六歲時瞎了右眼。後來又因為建築從基輔到波雅爾卡(Boiarka)鐵路得了傷寒與風濕病。一九二四年加入俄國共產黨，並回到故鄉謝比托夫卡鎮擔任黨的區委委員。由於身體狀況的急遽惡化，終於導致奧氏全身癱瘓，並且雙目失明。因為不願成為只領政府撫卹金的殘廢，原本教育有限的他，進入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函授學習。他期望能將自己在內戰時期的經歷與聽聞，寫成小說，用筆繼續為革命事業奮鬥。

據奧斯特洛夫斯基說，他撰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為了響應蘇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號召作家創造當代革命者的形象。<sup>12</sup>一九

---

<sup>12</sup>奧氏曾言早就想把自己親眼所見，甚至親身參與內戰的一些事寫出來，寫給加入蘇聯共青團團員，卻無緣目睹他們父輩為國英勇奮鬥的青年看。奧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等譯，〈我怎樣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的創作過程——在聯共（布）索契市委常委會議上的發言〉，《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1版，1995年第2版），

二八年他開始動筆寫作，可惜唯一手稿因郵寄而遺失。他雖然一度感到氣餒，最後仍振作精神，重新提筆，完成小說。最初沒有一個文學雜誌願意刊登，理由是人物欠缺說服力，文筆欠佳。後來經過一位與文學界關係良好的老黨員辛苦奔走，極力為小說請命，終於獲得《青年近衛軍》雜誌編輯 A. Kostrov 的首肯。編輯們歷經四年的修改，小說的第一部份終於在一九三二年春天於《青年近衛軍》（*Molodaia Gvardiia*，第 4 期）開始連載，第二部分則於一九三四年上半問世，並於當年結集成書出版。<sup>13</sup>剛開始這本小說並未受到重視。一直要到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七日他的名字和事蹟第一次刊載在《真理報》通訊報導「英勇」，方才一夕成名。<sup>14</sup>不久，紅軍組織讀書小組，研讀這本小說，並且認購了該書第一版的百分之八十。<sup>15</sup>各地組織，特別是黨小組，紛紛起而效尤，都被要求認真研讀、討論此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頓時風行蘇聯全國。在奧斯特洛夫斯基去世(1936)的前兩年間，

---

卷 2，頁 735、748。

<sup>13</sup>除了文字的潤飾，在情節方面，特別是與政治有關者，修改更多。例如，編輯刪除第一部份最後一章保爾參加工人反對派的敘述；刪除保爾為了冬妮婭迷人的眼睛而跳崖一景。第二部分更動最多，有關黨內與托洛斯基派的口舌交鋒部分幾乎全部被刪。結集出書時，書的編輯比雜誌的編輯對政治更敏感，書的內容與在雜誌連載期間並不完全相同。Elena Tolstaia-Stegal, “K Literaturnomu Fonu Knigi Kak Zakalialas’ Stal” (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的文學背景) in *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etique*, Oct.-Dec. 1981, XXII (4): 381, 383, 385, 389-392。蘇聯於一九八九年出版三卷本的《奧斯特洛夫斯基文集》，詳細列出小說被編輯刪去的部分。人民文學出版社於二〇〇〇年重印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全部譯出這些刪節部分。見頁 448-490。

<sup>14</sup>這篇報導乃是一九三四年底，名記者兼作家米·科利佐夫(Mikhail Kol'tsov)在黑海之濱的索契市(Sochi)訪問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成果。

<sup>15</sup>〈給父親和哥哥的信〉《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卷 2，頁 887。

小說用蘇聯各種民族語言重印重版了五十次。<sup>16</sup>直到一九八〇年代晚期，這本小說仍是每位蘇聯學生必讀作品。<sup>17</sup>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敘述主人翁保爾·柯察金，如何從一位原本缺乏政治意識的少年，歷經戰爭與革命的洗禮，以及數位老共產黨員的啓蒙與教導，成爲一個堅強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以奉獻革命、解放全人類的鬥爭，作爲一生的志業。他所成長的烏克蘭小鎮謝比托夫卡（亦即奧氏故鄉），由於是六條鐵路交會的樞紐，又離波蘭邊境不遠，乃是兵家必爭之地，也爲故事發展提供了豐富的背景。從一次大戰到蘇俄內戰，這個地方先後被德軍、紅軍、白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波蘭軍佔領過，最後是紅軍獲勝。故事始於保爾因故得罪了學校的神甫而被開除。在稅吏家幫傭的母親便將年僅十二歲的兒子，送到該城的火車站炊房，擔任燒水工作。那裡的工作環境讓他看到了有權勢的人如何壓迫下層勞動階級，而這也彷彿是當時社會的縮影。在偶然的機會，保爾從水兵朱赫來（一個老布爾什維克黨員）那裡得知布爾什維克黨專爲解放被壓迫人民的說法，十分贊同。從此開始暗地支持紅軍，並參加戰鬥，後來加入共青團，並參與修築鐵路的艱困工作。在這些過程中，保爾因爲受重傷，而成爲殘廢，終將癱瘓。但是他不願成爲只領國家撫卹金的廢人，積極尋思繼續爲革命事業獻身的其他方

<sup>16</sup>Lev Anninskii, *Kak Zakalialas' Stal' Nikolaia Ostrovskogo*, (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莫斯科,1988年第3版),頁7;黃樹南,〈譯者前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2-3;Eelena Tolstaia-Stegal, 頁383。該書在蘇聯被翻譯成四十二種語言(116種版本),在國外有十八種譯本(26種版本)。克士譯,〈尼可萊·奧斯特洛夫斯基〉,《新華月報》1.1(1949/11/15):297-298(譯自「蘇聯年曆」,1947)。

<sup>17</sup>David Gillespie,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Washington D.C.: Berg Publishers, 1996), p. 62.

式。故事以他決定用筆寫出自己一生經歷，等於是用筆重新加入革命事業，作為結尾。

奧斯特洛夫斯基特別強調這本小說不是他的自傳，雖然部分內容是他個人的經歷，但主要還是他所聽聞或目睹的真實故事。<sup>18</sup>然而對照他的生平，可以看出小說的關鍵情節還是以他的個人經歷為主，而這也正是這本小說最感動人的地方。他將書名取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意味著革命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如煉鋼一般，經過高溫大火與急遽冷卻的鍛鍊而成。編輯原覺得這樣的書名容易引起誤解，以為與真正的冶金煉鋼事業有關，但奧斯特洛夫斯基堅持用這個書名。他認為 KZS 這三個字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俄文縮寫），對青年而言，如同指南的燈塔一般。<sup>19</sup>

一九三五年十月，奧斯特洛夫斯基榮獲列寧勳章，他是第一個獲得這個獎章的蘇聯作家。當時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葛·彼得洛夫斯基(G. Petrovskii)為他的書作序時，特別指出這本書對蘇聯青年的共產主義教育的重要性。保爾的形象是教導後代應該如何生活與工作的模範。現代青年可從本書「汲取不少生活經驗，以避免錯誤；對抗墮落，肅清舊生活的渣滓，而重新革命地建設起新的家庭。」保爾為了將整個身心獻給社會主義鬥爭，最後放棄了對非無產階級出身的小姐的感情。不論是血戰中所受的重傷，或是威脅他生命重病，保爾都沒有

---

<sup>18</sup>他特別強調這本小說「不說不真實的話」。奧斯特洛夫斯基，〈對外國朋友們講的話〉，《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卷2，頁758。

<sup>19</sup>《新聞紀事報》駐莫斯科記者詢問奧氏，為何選擇這樣的書名？奧氏答道鋼鐵的堅硬是在烈火和急遽冷卻鍛鍊而來。他們那一代也是在這樣的鬥爭與考驗中鍛鍊出來的。〈對外國朋友們講的話〉，《奧斯特洛夫斯基兩卷集》，卷2，頁771；Elena Tolstaia-Stegal, p. 376。

因此受挫，仍然勇敢堅忍地為建設國家，為反對一切錯誤的政治傾向——為黨的列寧總路線而鬥爭。<sup>20</sup>保爾精神上的成長，也是成千上萬人民的成長，他們所參加的解放鬥爭和蘇維埃國家建設，決定了他們的成長。<sup>21</sup>蘇聯文學教科書的標準本更進一步指出，奧斯特洛夫斯基將保爾·柯察金的一生與帶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整整一代人的命運連結在一起。奧氏打開人類潛存的取之不盡的精神資源，證明了獻身於社會理想與共產主義，會產生出一種昇華、真正的道德、更豐富了人的精神面。<sup>22</sup>

在一九三〇年代的蘇聯，保爾的英雄典型事實上與當時的政治環境關係密切，亦可謂時勢造英雄。Lev Anninskii 即指出保爾是奧氏那一代的象徵。他與當時的歷史事件密不可分。<sup>23</sup>因為奧斯特洛夫斯基在這本小說中表明了十月革命裡，在反資反帝的內戰鬥爭中，「怎樣產生了和鞏固了工人與貧農的階級意識，怎樣產生了工農英雄。」<sup>24</sup>保爾鋼鐵般的意志是從戰爭、艱苦的環境磨練出來。同時，這本小說的許多情節也被蘇聯當局用來作為學習史大林版的聯共黨史的文藝參考資料。例如，書中描寫共青團員如何在嚴寒威脅下，努力不懈的修築鐵路，及消滅白軍殘餘份子和破壞份子的鬥爭，與托洛斯基份子的猛烈鬥爭，即可作為《聯共（布）黨史》第九章：布爾什維克黨在過

<sup>20</sup>葛·彼得洛夫斯基，〈序〉，《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香港：三聯書店，1972），頁 10-11。

<sup>21</sup>耶·巴拉巴諾維奇著，楊永譯，《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維奇·奧斯特洛夫斯基》（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62），頁 20。

<sup>22</sup>David Gillespie, *The Twentieth-Century Russian Novel: An Introduction*, p.62.

<sup>23</sup>Lev Anninskii, 《Kak Zakalialas' Stal'》 Nikolaia Ostrovskogo, p. 93.

<sup>24</sup>葛·彼得洛夫斯基，〈序〉，頁 9。

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1921-1925)的佐證。<sup>25</sup>

一九四二年，蘇共為激勵人民抵抗德軍侵略的愛國情緒，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小說拍成電影<sup>26</sup>，廣為宣傳保爾精神。二次大戰期間，蘇聯人民常常會在受傷或陣亡戰士的大衣裡找到這本彈痕累累的小說。<sup>27</sup>這些被飛機大砲所射穿的書本，迄今尚保存在博物館。一些蘇聯最勇敢的軍隊，往往都用保爾·柯察金來命名。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蕭洛霍夫曾說過，這本書已成為一部別開生面的生活教科書。<sup>28</sup>

## 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中國的翻譯與傳播

民國以來，五四時期是引進俄國文化的第一道強波。一九二〇年代的魯迅即認為俄國文學是中國的導師與朋友，並且積極將俄國文學譯成中文。<sup>29</sup>抗戰初起，造成翻譯蘇聯文學的另一高潮。當時翻譯的書籍以抵抗強權為主。<sup>30</sup>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毀滅》和《鐵流》。曹

<sup>25</sup> 勒·查列斯卡婭，莫·查列斯基，〈學習「聯共（布）黨史」的文藝參考資料〉，《中國青年》10(1953): 5。

<sup>26</sup> 導演為 Mark Donskoi。

<sup>27</sup> 列·費·葉爾紹夫著，北京師範大學蘇聯研究所譯，《蘇聯文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俄文版，1982），頁 230。

<sup>28</sup> 季莫菲耶夫主編，殷涵譯，《俄羅斯蘇維埃文學簡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59）；轉引自鄒振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載入中國革命史冊的教科書〉，《影響中國近代社會的一百種譯作》（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6），頁 411。

<sup>29</sup> 魯迅，〈祝中俄文字之交〉，《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卷 5，頁 53-58。

<sup>30</sup> 李明濱，《中國與俄蘇文化交流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靖華回憶在延安，《鐵流》翻印了好幾版，「參加長征的老幹部，幾乎人手一冊，幾乎成了部隊的教科書。」<sup>31</sup>這樣的說法，容或有誇大之嫌，卻也不能否認它所受到的重視與流程度。中共建國初期，掀起更巨大的譯介蘇聯文學的洪流。除了重印三〇年代出版的蘇聯文學作品，更翻譯許多新的作品。所翻譯的俄文書籍之多，有如過江之鯽。根據中共出版總署不完全的統計，自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一九五二年九月止，大陸出版的蘇聯書籍中譯本共約三千一百三十一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就有 12,166,100 多冊。其中列寧史大林著作佔六分之一。<sup>32</sup>至一九五三年，其中獲得史大林獎的蘇聯文學作品譯本即有七十九種之多。《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卓婭與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亞力山大·馬特洛索夫》、《我是勞動人民的兒子》、《日日夜夜》、《不屈的人們》、《絞刑架下的報告》、《丹孃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等都是當時的暢銷書；而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發行量最大。<sup>33</sup>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出現在中國的最早版本，是由段洛夫、陳非璜根據日譯本（1936年出版）轉譯而來，上海潮鋒出版社於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但是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版本則是梅益的翻譯。<sup>34</sup>根

---

頁 258-259。

<sup>31</sup> 曹靖華，〈蘇聯文學在中國——為蘇聯《真理報》而作〉，《人民日報》，1952年2月14日，第3版。

<sup>32</sup> 新華社，〈中蘇兩國三年來文化交流工作〉，《人民日報》，1952年12月9日，第3版。

<sup>33</sup> 〈我國大量出版蘇聯文學書籍中文譯本〉，《文匯報》（上海），1953年11月20日，第3版。

<sup>34</sup> 在一九四二年初版五千冊，銷路很好，同年五月上海遠方書店再版，以後大連中蘇友好協會、解放區的新華書店紛紛再版，甚至還有梅益譯本的改

據中共出版界的統計，中共建國之後銷售量最大的文藝小說，有楊沫的《青春之歌》等十七部，其中唯一的譯作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書從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銷售累計達二百零七萬冊。<sup>35</sup>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將一九四二年的梅益版本加以校訂修補後，出版的第一版(1952-1966)共印刷二十五次，發行一百多萬冊；第二版至第四版(1979-1995)共印刷三十二次，發行一百三十多萬冊；總共印刷了五十七次，計有二百五十餘萬冊。<sup>36</sup>可見該書的出版還是集中在中共建國初期，其時的大量發行很可能與蘇聯專家的建議有關。再者，由於考慮到不同程度的讀者與兒童，其他出版社還推出各種縮寫本與漫畫本。<sup>37</sup>

除了文字之外，保爾·柯察金還以其他方式與中國人民見面。早

---

編本與通俗本。鄒振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最早與影響最大的譯本〉，《譯林舊蹤》（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頁200。

<sup>35</sup>鄒振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載入中國革命史冊的教科書〉，《譯林舊蹤》，頁409-410。一九四九年秋天，蘇聯國際書店經理德奧米洛夫訪問中國時，認為該書「是中國青年今天最需要的一本讀物。」至少也要印幾十萬本，而不是三聯原先計劃出版的三千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工作報告（1949年10月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史料》（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5），冊1，頁376、633。

<sup>36</sup>梅益，〈譯後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頁493。

<sup>37</sup>例如，白刃縮寫本（天津：知識書店，1949）；中耀改編（北京：新華書局，1950年縮寫本）；彭達林科改編成戲劇，陸立之譯本（上海：北新書局，1951年1月初版，3月再版）；吳昭江、李晴改寫本（北京：開明書店，1952）；潘安榮註釋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一九五九年由人民美術出版社首次出版連環畫，共四百多幅畫。王素、夏星改編，毅進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在國共內戰期間，東北已演出《保爾·柯察金》的話劇。<sup>38</sup>一九四九年秋天，北京新華電台即開始在兒童時間連續廣播保爾的故事。<sup>39</sup>一九五〇年十月北京青年劇團演出話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由周恩來的養女孫維世擔任導演，著名演員金山飾演保爾。<sup>40</sup>話劇演出近三個月，一票難求。<sup>41</sup>一九五二年年初，華東海政文工二團在上海亦演出話劇。<sup>42</sup>此外，韓戰初起之時，中共為配合抗美援朝保衛國家運動，有關當局趕譯並上映蘇聯電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42年拍攝）。<sup>43</sup>這部電影可能由於戰時製作倉促，結構散漫，情節沈悶，人物塑造單調乏味。一九五六年由 Aleksandr Alov 和 Paul Naumov，重新執導，片名改為《保爾·柯察金》。故事內容略有更改，但是情節變得較為緊湊、明快，比原著小說更為生動，加上演員稱職，表現可圈可點，凡是看過電影的人，莫不對保爾留下深刻印象。一九五七年，中共為慶祝十月革命四十週年，又為了配合中蘇友好月活動，將電影《保爾·柯察金》配上中文發音，在中國大陸二十九個城市播放。遼寧省還派

<sup>38</sup>最早是一九四八年夏天的哈爾濱。高莽，〈保爾精神不死〉，《人民日報》，1990年7月11日，第8版；魯直，〈保爾教育了我們：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是怎樣的人？〉，原載東北旅大區《文藝報》，第13期；轉引自《中國青年》20（1949/09/24）：7-8。

<sup>39</sup>〈新華電台今晚要目〉，《人民日報》，1949年9月21日，第4版。

<sup>40</sup>許國榮、左萊，《金山傳》（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

<sup>41</sup>曹靖華，〈蘇聯文學在中國——為蘇聯《真理報》而作〉，《人民日報》，1952年2月14日，第3版。

<sup>42</sup>《解放日報》，1951年1月8日，第2版。華東軍區海政文工二團演出四幕八場蘇聯名劇「保爾·柯察金」，導演田愷。一月四日即有廣告，預售門票；六日開始上演。《解放日報》，1951年2月2日，第2版。

<sup>43</sup>〈好電影介紹〉，《人民日報》，1950年3月4日，第6版；〈電影局三製片場翻譯片工作者報告工作〉，《人民日報》，1951年3月4日，第1版。

出二百個電影隊到山區農村去放映。<sup>44</sup>廣為人知的保爾英雄形象與電影媒介的傳播有很大關係。一九五〇年代的中國大陸，文盲仍占絕大多數，透過這種無遠弗屆的非文字媒體，它的宣傳功效自然要比文字大得多。

另外，透過語文教材的學習，也是灌輸保爾精神的一個管道。小說中〈築路〉那一段，即被編入中學的語文教科書。成立保爾班亦是宣揚保爾精神的方法之一。一九五二年，北京五中在取得北京教育局和蘇聯大使館的同意後，命名了第一屆「保爾班」，學生以爭取優秀的成績為鵠的。保爾班的教室還會掛著保爾的畫像。<sup>45</sup>其他城市的學校也相繼成立保爾班，並且以能屆屆相傳為榮。<sup>46</sup>此外，也有中學發起「讀好書、學保爾」的活動，要效法保爾精神，忘我地為祖國勞動。<sup>47</sup>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在大陸十分風行的小說，也曾悄然登陸臺灣。只是在一九五〇年代的臺灣，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環境使然，這本在大陸被中共力捧的紅書，到了臺灣卻變成禁書。國民黨當局不但不鼓勵人民閱讀，反而會因為閱讀該書而惹禍上身。當時曾有

---

<sup>44</sup> 〈蘇聯電影週勝利結束〉，《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7日，第4版。

<sup>45</sup> 徐祖哲（當年「保爾班」學生），〈保爾精神鼓舞我們前進〉，<http://www.zhongo.com>。

<sup>46</sup> 例如，一九五二年中蘇友好月時，昆明一女中高十三班，即爭取命名為保爾·柯察金班。在保爾形象的鼓舞下，他們成了全校優秀班。畢業時他們將此稱號送給紀律、成績均不好的初三十九班，全班有一半的人代數不及格，在保爾頑強精神的鼓舞下，畢業前全班已無不及格現象。陳兆祥，〈保爾早就來了〉，《中國青年報》，1957年1月13日，第1版。

<sup>47</sup> 一九五五年，江蘇連雲市海州初中，即發起這樣的運動，並得到奧斯特洛夫斯基夫人來信鼓勵。見楊永明，〈要為祖國忘我地勞動〉，《人民日報》，1990年5月13日，第7版。

十二名臺灣青年以叛亂罪名被軍方起訴，其中的一條罪名就是向人宣講「匪」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軍事檢察官所舉證的「事實」之一是：他們「於民國四十二年十月一日匪幫『國慶日』舉行加菜及互相檢討批評暨研究匪黨理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意志克服環境》等問題。」<sup>48</sup>

### 三、保爾的英雄典型與塑造「社會主義新人」

自延安時期以來，如何塑造英雄典型，始終是中共文藝界一個重大課題。惟本文限於篇幅，無法在此討論。這裡僅就《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書中所呈現的保爾英雄典型及其精神，作一綜述。保爾一生的最高目標，乃是為黨、為革命獻身；其他一切都臣服在這個終極目標之下。左右他思想的兩大原則分別是階級觀念與集體意識。保爾一切作為都可以從這兩個角度去理解。現分述於下。

#### （一）愛情

工人出身的保爾無意間愛上了林務官的女兒冬妮婭。他們的感情第一次出現嚴重裂痕是在保爾帶冬妮婭出席城裡的共青團全體大會。衣著漂亮的冬妮婭，置身於一群衣衫襤褸的共青團員中，不但十分顯眼，而且格格不入。保爾當時覺得既為難又生氣；他多麼希望冬妮婭能擺脫資產階級的一切束縛，跟他一起加入革命行列。但是，冬妮婭雖然有勇氣愛上一名工人，卻不愛工人階級的理想，保爾只有選

---

<sup>48</sup>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43）審三字第五二號），民國四十三年，施顯華先生提供資料。

擇分手一途。在他們的分手談話中，他對冬妮婭說：「我首先是屬於黨的，其次才是屬於你和別的親人們的。」他與共青團員麗達的感情也因為革命事業未成而不願考慮，<sup>49</sup>頗有匈奴不滅，何以家為的氣概。雖然後來他也承認這樣的態度是種革命浪漫主義精神，在感情上會造成遺憾，但他還是相信他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最後他與達雅結為夫妻，也是因為他覺得對這個年輕女子有一種使命感，要幫助達雅成為黨的一員，否則他就一文不值。<sup>50</sup>這些愛情的經驗其實都是對革命忠貞度的考驗，亦即黨性的鍛鍊。保爾認為人的階級關係比愛情更重要。

## （二）事業

小說對保爾的英雄形象刻劃最出色的章篇之一是築路。從波雅爾卡車站修築一條直達伐木場的窄軌鐵路，以便提供基輔冬天的燃料。它深刻地描繪保爾與共青團員如何在冰天雪地、風雨交加的環境下工作，睡的是冷濕的水泥地，吃的是麵包屑，穿的是單薄的衣服與浸入雪水的破靴，還得忍受匪徒的侵襲與疾病的侵擾，但是保爾與共青團員並沒有因此感到氣餒，反而鬥志高昂，奮力不懈。這段情節清楚地說明了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也因此被編入中學語文教科書。保爾每天在狂熱的激戰與建設中，使他已經溶化在集體裡，完全忘了「我」的存在。在他的眼中，只有黨的「大我」，沒有個人的「小我」，只有集體意識，沒有個人意識。

---

<sup>49</sup>《鋼鐵是怎樣煉成的》（1995年第5版，2000年第8刷），頁201-202、222。

<sup>50</sup>《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384-385、426、439。

### (三) 生死

由於戰爭受傷、修路受寒，導致保爾的健康嚴重受損，終成殘廢。他雖曾有短暫的悲觀消極情緒，甚至有自殺的念頭，但這一切都被他爲了黨、爲了革命服務的情懷而克服了。他認爲生活中，再沒有比掉隊更令人恐懼的了。只要他的心臟還在跳動，就不能叫他離開黨。能使他離開戰鬥行列的，只有死。當他在海邊回顧他二十四年來的歲月，曾經猶豫是否要一槍毀掉那個背叛了他的肉體，繼而覺得這是種懦弱的作法。最後他以「即使生活到了實在是難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變得有益於人民！」作爲結論。<sup>51</sup>

簡言之，所謂保爾精神，就是強調正確戀愛觀植基於階級與革命；必須明確階級觀點，提高階級覺悟，堅定無產階級立場；在工作與生活方面，要培養鋼鐵般的意志，堅持革命樂觀主義。而保爾的英雄主義是集體英雄主義，不是個人英雄主義。

在蘇聯，共青團是宣傳、研讀《鋼鐵》小說，動員學習保爾精神的主要官方機構。在中國大陸亦然。中共共青團及其機關刊物《中國青年》雜誌、《中國青年報》均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可惜目前限於檔案之不足，無法清楚瞭解共青團宣傳與動員的實際運作情形。但是從一些已出版的刊物，尚可略知一二。

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話劇，即將在北京演出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7年改稱爲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副書記廖承志，即指出演出目的有二：(1)向中國青年介紹蘇聯青年經過怎樣的奮鬥路途；蘇

---

<sup>51</sup>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 191、404、419、424。

聯共青團經過怎樣的途徑成熟與強大；蘇聯共青團如何成爲黨的後備軍。(2)向蘇聯學習，使中國共青團更進一步群眾化，提高政治覺悟，使黨員具有高尚革命品質，像保爾一樣。<sup>52</sup>

一九五七年一月，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來華訪問，並到各級學校（包括北京大學）講述奧氏生平事蹟與宣揚保爾精神。<sup>53</sup>北京大學共青團打鐵趁熱，爲促銷保爾精神，即以北大學生黃堅的案例，透過師生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保爾精神。黃堅十六歲時，家鄉成爲共產黨統治的地區，父親也因而有了工作。他在學校曾是第一批積極份子，加入青年團。參加土改宣傳工作時，他與同班女同學隸華成爲好友。抗美援朝時，共產黨號召參軍。黃堅決心放下書本，報名參軍，並說服隸華一同參加。臨行前，隸華突然變卦不去。五年後，黃堅從解放軍轉業，考上北大，重回學校。一次偶然機會，兩人重逢，黃堅得知隸華已從大學畢業，現在科研機關工作，她與她的丈夫已在科學刊物上發表過好幾篇論文。黃堅不禁要自問是他自己錯了，還是隸華錯了？黃堅自認因爲進步而參軍，卻庸庸碌碌過了五年，如果不「醒悟」，還會庸庸碌碌過一輩子。他得到的痛苦結論是，他爲了政治活動，放棄了學業，等於是放棄了爲人民服務的本錢。歲月不饒人，生活的經驗證明：忽視政治的人佔便宜。這些人將時間用在學業，學到了真本領；而政治活動只是說說而已，不能解決問題。黃堅最後的結論是，過去他「太幼稚了。……對一切都是那麼迷信，要追求電影小

<sup>52</sup> 廖承志，〈演出保爾·柯察金的意義〉，《人民日報》，1950年9月20日，第3版。

<sup>53</sup> 她於一月五日訪問北大。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記事，1898-199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上冊，頁512；〈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同北京青年見面〉，《人民日報》，1957年1月21日，第4版。

說裡描寫過的生活。幾年來，我明白了，這種生活，這種犧牲一切的英雄，在現實中都是沒有的，他只不過是作家和藝術大師們的理想而已。以往，我正是吃了幼稚的虧，現在應該老練點了。」但黃堅對這樣的結論又有幾分疑惑與不安。他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嚴重的掉隊，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曾想到要退團，省得成爲團組織的包袱，也省得心裡不安。但他又沒有這樣做，卻不曉得往後的路該怎麼走？<sup>54</sup>他將自己的問題投書到北大校刊，請求指點。

黃堅的投書，引起了學校師生熱烈的討論。有讀者認爲黃堅的看法不完全錯，因爲用心於學業和參與政治，在時間上會起衝突，而學生的本份就是以學習爲主。<sup>55</sup>另有讀者認爲黃堅也指出部分客觀事實，亦即如果他不參軍，在學業上會有更大的成就，這對科學落後的中國貢獻更大。<sup>56</sup>但也有讀者提出自己曾有過類似黃堅的經歷，並堅持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爲在北大生活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他也以參加這革命鬥爭爲傲。黃堅參加韓戰並沒有白白浪費生命，在書本知識上雖落後，卻得到更生動、深刻的教育。在革命的路上並沒有停滯與落後。<sup>57</sup>這樣的敘述與觀點和保爾自我反省後，對自己一生做出的結語幾乎如出一轍。同時，有更多的讀者認爲黃堅將個人名譽、地位與革命貢獻混爲一談；他沒有正確理解對革命貢獻的問題，反而蒙上了個人主義的陰影。這些讀者一致認爲黃堅過去所做

<sup>54</sup> 〈青年團員的稱號意味著什麼？〉，《北京大學校刊》109 (1957/03/03)，第4版。

<sup>55</sup> 彥東，〈我認爲學生不必做社會工作〉，《北京大學校刊》111 (1957/03/16)，第3版。

<sup>56</sup> 石新，〈這也是客觀事實〉，《北京大學校刊》110 (1957/03/11)，第3版。

<sup>57</sup> 王克武，〈我們愛唱這支歌〉，《北京大學校刊》110 (1957/03/11)，第3版。

的並沒有錯，錯的是現在的想法。他們呼籲黃堅應該鞏固革命的人生觀，不要計較個人得失，集體利益高於個人利益。真正的幸福是生活在集體中，共同為革命犧牲奮鬥。<sup>58</sup>

最後，北京大學青年團團委會宣傳部總結，應該學習保爾的精神：「那種對敵人無比的恨，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祖國無比的愛，學習保爾在平凡而又偉大的勞動中吃苦耐勞、艱苦奮鬥的精神，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sup>59</sup>黃堅的經歷與問題在當時的青年之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共青團透過這樣的討論方式，無疑是要將保爾精神更深入青年的生活。

#### 四、保爾精神與時勢政局的發展

保爾的英雄典型介紹到中國之後，其內涵也隨著中共的各種政治運動，被官方賦予不同的任務與解讀。根據譯者梅益的回憶，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八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劉少文交給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英譯本<sup>60</sup>，並言黨組織認為這部作品對中國讀者，「特別是青年讀者很有教育意義」，希望梅益能以作為組織交辦的任務盡快譯

<sup>58</sup> 〈大家討論：青年團員的稱號意味著什麼？〉，《北京大學校刊》110 (1957/03/11)，第3版；111 (1957/03/16)，第3版；114 (1957/04/06)，第4版；〈大家討論：怎樣正確對待政治與業務的關係？〉《北京大學校刊》116 (1957/04/19)，第4版。

<sup>59</sup> (青年團)團委會宣傳部，〈向保爾·柯察金學習〉，《北京大學校刊》173 (1957/11/30)，第4版。

<sup>60</sup> 這本英譯本的譯者是阿歷斯·布朗(Alec Brown)，書名叫做 *The Making of A Hero*，而不是後來照俄文書名翻譯的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紐約，1937年出版)。

完。當時梅益因編報與妻小重病，至撤離上海前夕，即一九四一年冬才譯完。一九四二年夏由上海新知出版社出版；不但在上海發行，還送到內地和根據地去。<sup>61</sup>譯本出版之後，馬上在整風運動中紮上一角。中共當局號召要「學習保爾·柯察金的優秀品質」，努力提高思想覺悟程度，鍛鍊黨性。<sup>62</sup>凡是不喜歡該書的讀者，就會被認為具有資產階級傾向。<sup>63</sup>到了國共內戰時期，中共出版縮寫本的目的不只是因為原來的書厚價高，讀者既然以青年與幹部為主，許多人又正忙於戰鬥和工作，沒有時間閱讀長達三十萬字的原著。更重要的理由是「本書曾給許多青年無比熱情與勇氣而走上革命道路，且在艱苦的敵後鬥爭中，更堅定的意志」。<sup>64</sup>

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上海電影製片場趕譯並放映《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電影，<sup>65</sup>以便藉此宣傳保爾的愛國精神。同時各界為激勵官兵，寄去前線的物資中，常包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小說。<sup>66</sup>而各級學校的學生為呼應政府提倡的保爾愛國精神，紛紛在

<sup>61</sup>梅益，〈重版後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頁527；譯文曾由姜椿芳根據俄文加以校閱增補。梅益，〈深情的懷念〉，收入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頁66。

<sup>62</sup>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頁176。

<sup>63</sup>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0），頁432。中央黨校三部女學員朱明，在延安整風時的自我檢討，提到資產階級教育使她對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被開墾的處女地》不感興趣。

<sup>64</sup>白刃縮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縮寫本）（天津：知識書店，1949）。

<sup>65</sup>〈電影局三製片廠翻譯片工作者報告〉，《人民日報》，1951年3月4日，第1版。

<sup>66</sup>鄭延，〈介紹北京市少年兒童隊的時事教育活動〉，《人民日報》，1951年1月20日，第3版；〈朝鮮前線戰士渴望文化食糧 歡迎大家捐送書籍〉，

校成立保爾戰鬥隊，或報考軍事幹部學校。<sup>67</sup>甚至在一九五八年的臺海危機時，北大軍事保爾團宣稱，也要效法保爾精神，「只要黨一聲令下，就立刻開向火線。」<sup>68</sup>而在戰爭結束後，中共當局面臨從內戰、韓戰以來，大量復員後傷殘軍人的心理建設，實有必要積極提倡保爾的樂觀主義，頑強地、堅韌地與命運搏鬥。這也是為什麼《人民日報》報導革命殘廢軍人學校或榮軍教養院時，特別強調這些軍人如何身殘志堅，勇敢地面對肢殘之後的人生挑戰，依然努力學習，爭取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他們因此均被冠稱為「中國的保爾」。<sup>69</sup>

一九五三年，中共開始實行第一個五年計畫，主要重點就是進行蘇聯協助中國大陸設計的一百五十六個重點項目，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而從奧斯特洛夫斯基小說的書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

《人民日報》，1951年2月26日，第2版；魏巍，〈年輕人，讓你的青春更美麗吧〉，《人民日報》，1951年6月16日，第4版；〈春節各地熱烈進行撫軍優屬活動〉，《人民日報》，1953年2月18日，第1版。

<sup>67</sup> 王士谷，〈北京青年團員為抗美援朝鞏固國防而戰鬥！〉，《人民日報》，1951年12月1日，第1版；〈走向光榮崗位 為祖國人民立功〉，《人民日報》，1950年12月3日，第2版；〈京津中南等地青年學生工人紛紛準備參加軍事幹部學校〉，《人民日報》，1950年12月8日，第2版；〈以積極份子的行動代替了群眾性的運動——評部分報紙對參加軍幹校的報導〉，《人民日報》，1951年1月8日，第3版；〈各地學生踴躍報名投考軍幹校〉，《人民日報》，1951年7月3日，第1版。

<sup>68</sup> 〈全民動員的號角響了〉，《人民日報》，1958年9月8日，第3版。

<sup>69</sup> 齊緯，〈最高貴的人——訪河南省革命殘廢軍人學校〉，《人民日報》，1952年12月20日，第3版；馬少波，〈最動人的藝術〉，《人民日報》，1958年6月4日，第8版；〈同身殘志不殘的英雄話別：文聯歡送四川革命殘廢軍人課餘演出隊〉，《人民日報》，1958年8月5日，第4版；周祖佑，〈他們永遠是無畏的戰士——記四川革命殘廢軍人教養院的休養員〉，《人民日報》，1959年2月26日，第6版。

意涵企圖將人的意志也鍛鍊成如鋼鐵般的堅強，隱約呼應當時蘇聯政府工業化，亟欲躋入現代國家之林的訴求。<sup>70</sup>中共提倡保爾精神，亦是有意藉此推行人的精神工業化，協助中共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中共為解決城市青年失業問題，加上農業合作化運動與發展國營農場，需要大量工作人員，政府因此鼓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到邊遠地區墾荒或到農村發展文化工作。<sup>71</sup>在這些上山下鄉的人和因為一九五七年反右運動而被下放者之中，也有秉持保爾刻苦耐勞、不畏艱辛的精神，從事過去知識分子所輕視的工作。<sup>72</sup>而在城市的居民也被組織參加義務勞動，例如北京市民組織保爾隊或學生的保爾排，勞動時高舉保爾的畫像，參加建設十三陵水庫等。<sup>73</sup>

<sup>70</sup> 余一中認為這裡的「鋼鐵」與史大林崇拜及其政治路線有關，因為史大林的俄文姓(Stalin)的字根就是「鋼」(Stal')。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2 (1998): 65。我認為「鋼鐵」一詞的使用與史大林的政治路線有關，但與史大林個人崇拜無關。理由有二：整本小說並沒有特別突出史大林的角色。保爾的政治導師是紅軍老戰士或老黨員，不是史大林。再者，小說完成之際，蘇聯作家協會剛成立，寫作尚有相當自由。換言之，一九三〇年代上半，蘇聯文學作品尚未出現對史大林的個人崇拜。

<sup>71</sup> 這也是受了蘇聯正在轟轟烈烈進行的青年墾荒運動影響。中共青年團在方法上也有模仿蘇聯之處。定宜庄，《中國知青史——初瀾 1953-1968》（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40-45；杜鴻林，《風潮蕩落（1955-1979）——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頁18-19。

<sup>72</sup> 〈墾荒、築路、種菜開始了建設山區的第一步〉，《人民日報》，1958年1月27日，第4版；王昆侖，〈送女下放三首〉，《人民日報》，1958年1月28日，第8版；張正常，〈下鄉鍛鍊日記〉，《人民日報》，1958年2月13日，第4版。

<sup>73</sup> 〈四個多月達六百八十萬人次，首都人民爭先參加義務勞動〉《人民日報》，1958年5月17日，第4版。

有趣的是，保爾這位蘇聯英雄在中蘇關係惡化期間，在中國大陸扮演了十分弔詭的角色。一九五六年，赫魯雪夫在蘇共第二十大屆代表大會上嚴厲譴責史大林個人崇拜的錯誤及其對黨國元老大整肅的罪行。毛澤東認為赫魯雪夫全部否定史大林是錯誤的，蘇聯因此已經走上修正主義的道路。一九六〇年赫魯雪夫突然決定召回全部蘇聯在華顧問，中蘇雙方的叫囂與對罵，節節高昇。此時保爾的英雄形象，一方面已漸漸為中國英雄雷鋒所取代；另一方面，中共則以保爾精神的維護者自居，以保爾精神作為痛斥蘇共修正主義的武器之一。在這場中蘇意識形態的論戰中，中共認為誰熱愛保爾，誰就是社會主義的正統。中國共青團總書記胡耀邦在全國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嚴厲指責蘇聯的修正主義，聲稱蘇聯當前所提倡的是個人主義。他說蘇聯不但批評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戰士雷鋒「沒有頭腦」、「荒唐」，而且認為保爾·柯察金的時代已經過去。保爾「那種苦行僧式的共產主義者，對於達到狂熱赴死程度的自我犧牲精神，是過於熱中，也過於長久地加以英雄化。」<sup>74</sup>其次，旅蘇學生亦指證歷歷地聲稱，蘇聯《共青團真理報》曾經刊出保爾精神已過時的文章，還宣傳「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產階級人生觀」。<sup>75</sup>筆者雖然一時無法證實這篇新聞報導，但證諸一九六六年十月四日，蘇聯當局仍在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家鄉樹立他的銅像，並將奧氏等同於保爾，<sup>76</sup>則很可能這樣的報導有斷

<sup>74</sup>胡耀邦，〈為我國青年革命化而鬥爭〉，《人民日報》，1964年7月7日，第2版。

<sup>75</sup>〈我留蘇學生代表憤怒揭露蘇修領導集團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人民日報》，1966年11月15日，第4版。

<sup>76</sup>A. Levina & S. Esman, "Pravoflangovyi Komsomolii: V Shepetovka otkryt pamianik Nikolaiu Ostrovskomu," (共青團員的標兵：尼·奧斯特洛夫斯基

章取義、流於意氣之嫌。其可靠性，必須存疑。

整體而言，一九六〇年代，中共對保爾精神的宣傳重點主要放在階級對立與鬥爭的框架處理。例如一九六三年小說以連環畫形式出版時，強調的即是保爾的無產階級出身與為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sup>77</sup>一九六四年，程代熙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序言中稱讚該小說是「一本告訴人們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不要忘記過去的好書，也是一本給人長革命志氣、增革命幹勁的好書。」<sup>78</sup>在文革期間，保爾精神再度被中共拿來當作有力的政治武器。對外，繼續用來批判蘇聯的修正主義；對內，用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鬥爭精神。七〇年代初期，四人幫尚大權在握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曾經數次打算再版梅益的譯本，但是因為譯者是「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一直無法付梓。<sup>79</sup>

而這種文革的階級對立與強調鬥爭，更反映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大慶油田採油三部部分工人、黑龍江大學中文系七三級工農兵學員和革命教師經過座談、討論，為新譯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寫的前言：「今天閱讀這部小說，會使我們更加珍愛無產階級專政，更加憎恨蘇修叛徒集團，更加堅定把反修防修鬥爭進行到底的決心。」文章稱讚保爾·柯察金是「無產階級戰士的典型形象，在他的身上反映了整個

---

雕像在謝比托夫卡揭幕）*Komsomol'skaia Pravda*（《共青團真理報》），1966年10月4日，頁1。

<sup>77</sup>王素、夏星改編，毅進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

<sup>78</sup>程代熙，〈譯本序〉，梅益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頁15。

<sup>79</sup>梅益，〈重版後記〉，《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頁528。

一代革命青年的鬥爭歷程和革命精神。」「保爾不斷擊退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襲，克服種種非無產階級的意識，他對自己的錯誤和缺點從不姑息。」他「自覺地抵制資產階級思想的毒害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的侵蝕，主動地向他們發起攻擊。為維護無產階級在組織上和思想上的純潔，他愛憎分明，疾惡如仇，……」。他的「全部精力和整個生命都獻給了建立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鬥爭，都獻給了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sup>80</sup>他們還以文革期間提倡英雄必須「高、大、全」的標準，來檢驗《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不足之處。他們認為小說對保爾和冬妮婭的感情描寫，渲染過多；在描寫保爾喪失健康和他的作品尚未出版時，流露某種絕望情緒，亦是一項缺失。這些都影響了保爾的英雄形象。<sup>81</sup>這些人對保爾形象提出的批評，亦表示文革期間所要求的英雄典型，必須在階級、道德、行為方面完美無缺。

## 五、民間的解讀

雖然《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五〇、六〇年代發行量極高，甚至是當時中譯小說中銷售最多者，但單從銷售量並不足以完全說明實際上，它就是民間最受歡迎的小說。因為銷售量高也與官方指示性的大量發行、購買有關。但是也不該忽略當時有許多沒有餘裕買書的人，是透過圖書館或親友同儕輾轉借閱該書。如果把官方宣傳的保爾精神

---

<sup>80</sup>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七二級工農兵學員合譯，根據一九五三年版本譯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頁1、3-4、6-9。

<sup>81</sup>黑龍江大學俄語系翻譯組和俄語系七二級工農兵學員合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頁9。

當作是一種產品，那麼一旦產品離開官方這個生產者之手，消費者要如何使用這項產品，生產者便難以干涉。這也是解讀民間反應最複雜的地方：它可能有與官方宣傳契合的地方，也可能出現不同，甚至完全背道而馳的解讀。

呼應官方說法或接受官方宣傳保爾精神的讀者，自然不少。在各種官方報刊雜誌都可以看到這樣的論調。他們咸認青年應該響應黨的號召，願意到祖國最需要、最艱苦的地方去，重新創造美好的生活。保爾那一切爲了祖國而忘我犧牲的高貴品質永遠值得效法。<sup>82</sup>當中共號召知青上山下鄉時，確實有許多熱血青年，在保爾精神的鼓勵下，積極投入各種國家建設，志願支援新疆建設等。<sup>83</sup>作家老鬼（馬波，楊沫的兒子）還是中學生時，決定到內蒙古兵團勞動，而保爾在小車站上的狂熱苦幹的精神，即是他的楷模。<sup>84</sup>雖然也有人是被迫下放勞改，在無盡的屈辱和沈重的勞役中，是保爾精神陪他們在泥濘中跋涉，度過他們的人生逆境。<sup>85</sup>

其實，保爾精神最令人感動，令人效法最多的是他在已成殘廢的

---

<sup>82</sup>王成玉，〈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影片保爾·柯察金觀後隨筆〉，《北京日報》，1957年11月10日。第3版。羅明，〈保爾·柯察金給我的感受〉，《新疆日報》，1957年11月17日，第3版。葉軍（北京大學），〈保爾的“得”“失”〉，《中國青年》24（1957）：22。

<sup>83</sup>張惠仁，〈拿起鐵錘 千萬不能摔倒〉，《中國青年報》，1957年11月22日，第3版；李輝、藍英年，〈一個世紀的漫長接觸和影響——關於蘇聯文學與中國的對話（上）〉，（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12.htm>，（2000/11/17）。

<sup>84</sup>老鬼，《血與鐵》（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頁54。

<sup>85</sup>範若丁，〈尋找保爾·柯察金〉，<http://book.peopledaily.com.cn/big5/paper17/1/class001700002/hwz1119.htm>（2000/11/11）。

情況下，仍能不對冷酷的命運低頭，繼續迎接生活挑戰，並且戰勝挑戰。這對眾多或因天生病殘，或因戰爭、工作、意外成殘者，提倡學習近乎真人真事的保爾精神，幫助他們度過人生難關，是最有效的精神鼓舞。例如，二十四歲的青年阮頌銘因風濕性關節炎長期臥病在床，原對自己的前途感到絕望，《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帶給他勇氣與希望。他決心學俄文，經過多年努力，發表許多譯作。這在許多城市均有類似的例子。<sup>86</sup>又如，一位初中生廖貽訓參加韓戰負傷，四肢殘廢，只剩大拇指尚能活動。他躺在床上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年近衛軍》、《真正的人》，鼓舞其鬥爭意志與勝利信心，並特別效法保爾精神，努力學習寫字。<sup>87</sup>另一位因韓戰失去雙臂的黃仁川，因為看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連環畫，重新站起來，當上宣傳員，也學會用嘴畫畫。<sup>88</sup>這樣的案例，《人民日報》每年總有幾則報導。而這與官方主流思想並不矛盾。

效法保爾精神最有趣的可能是高玉寶。貧農出身的士兵高玉寶，只受過一個月的教育，寫十個字，就得問七、八個字，受到毛澤東質疑為何中國小說沒有以耕田漢為主角的啟發，決定提筆寫自傳。寫作期間軍中有位宣傳股長對他說了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故事，而大受鼓舞。這位「文藝戰士」信心滿滿地說：「瞎眼的奧斯特洛夫斯基能寫，

---

<sup>86</sup>姚遠方，〈蘇聯文學和中國青年〉，《中國青年》21 (1957): 7；李士媛，〈保爾·柯察金鼓舞我前進〉，《新中國婦女》10 (1954): 12-13、17；吳嘉，〈「鋼鐵就是這樣煉成的」(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生)讀後〉，《中國青年》81 (1951): 31；彭樹智，〈蘇聯文藝作品鼓舞我戰勝了疾病〉，《中國青年》21 (1953): 33。

<sup>87</sup>廖貽訓，〈重新戰鬥的開始〉，《人民日報》，1952年1月6日，第4版。

<sup>88</sup>樊炳義，〈黨的優秀的宣傳員〉，《人民日報》，1959年5月19日，第6版。

睜眼的我慢慢寫，總比瞎子寫得好。」結果寫成一部長達三十萬字的自傳小說《高玉寶》。<sup>89</sup>不過，在官方表揚工農兵作家的高潮過去之後，他的小說則乏人問津。

不同年齡學習英雄的行為也會有所不同。大學生有大學生的解讀，小學生有小學生的體會。對好動、頑皮的小學生來說，最吸引他們的恐怕是保爾在小說中幾場打架的情節。保爾的調皮搗蛋最對小學生的胃，特別是常被老師處罰的學生，對保爾在學校因惡作劇而受罰，更能引起共鳴。保爾的故事給他們指出一條光明大道：在校是劣等生，長大之後也可以成為英雄。<sup>90</sup>作家老鬼回憶他讀小學時，北京正在上映《保爾·柯察金》這部電影，他百看不厭。他認為保爾將纨绔子弟維克多打到河裡那一段最精彩。這場面給他許多影響和啓示，其中包括打架能夠贏得美人心，「美麗高貴的冬妮婭就是因為保爾會打架才跟他好的」。他和同學們常在晚自習之後，冒著寒風，跑向宿舍之際，學保爾騎馬衝鋒的樣子，高唱電影主題曲。<sup>91</sup>他覺得這首歌有股神秘的力量，一唱起來，非抬頭挺胸不可，一點也不怕冷。反而渾身是勁，「很想找個壞蛋殺一番」，同時也想體會保爾殺白軍的味

---

<sup>89</sup>高玉寶的寫作方式：不會寫的字，或寫別字代替，或畫各種圖形符號代替，如果連畫也畫不出來的字，就畫個圓圈。他寫好一段，問人家一段，把整段字問清了，再謄清在另一個大本子上。〈英雄的文藝戰士高玉寶〉，《人民日報》，1951年12月16日，第4版；高玉寶，〈我是怎樣學習文化和學習寫作的？〉，《人民日報》，1952年6月8日，第4版。

<sup>90</sup>〈鋼鐵咋這樣煉成了？〉，<http://www.zhonggo.com> (2000)。

<sup>91</sup>中文第一段歌詞如下：「仇恨的旋風在頭上怒號，黑暗的勢力還在喧囂，我們和敵人做絕死的戰鬥，誰勝誰負等待我們答覆。我們的鬥爭，神聖而正義，前進向前進，工人兄弟，我們的鬥爭，神聖而正義，前進向前進，工人兄弟。」

道。<sup>92</sup>老鬼小時候的英雄夢比其他同齡小孩濃厚得多。但是革命英雄應該殘酷地對待敵人，卻是當時許多中小學生共有的想法。文革時期使用殘忍的暴力對待所謂的「階級敵人」的成因很多，其中之一即是這種模仿革命英雄的觀念，訴諸行動之餘，造成的不幸後果。

從資料顯示，官方全力宣傳閱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主要是在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到了晚期青年的閱讀興趣似有轉移。根據共青團浙江省委調查，浙江青年的閱讀和欣賞興趣，由一些官方認為有教育意義的作品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把一切獻給黨》、《普通一兵》、《高玉寶》等，轉向中國古典文學如《水滸傳》、《封神榜》、《三國演義》、《聊齋誌異》、《紅樓夢》等。<sup>93</sup>就作品的藝術性而言，這些中國古典作品遠比那些官方認為有教育意義卻是硬梆梆內容與說教的作品，更能引人入勝。這樣的心理與觀眾愛看古代戲，不愛看反映當前生活和鬥爭的戲，頗有異曲同工之妙。<sup>94</sup>

換言之，自中共建國以來，國家機器宣傳的重點一直放在如何為黨國服務、犧牲奉獻，所強調的都是公領域的行為模範，對於私領域個人情感的發洩不是被忽視，就是希望像處理公事一般的完全理性對待。然而人畢竟是感情的動物，總有需要抒發、宣洩感情的時候，不可能無時無刻都將自己緊繃起來。長期用十分理性的態度處理感情，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這或許也是為什麼青年閱讀興趣轉移，會從官方認可的說教式作品，轉向中國古典文學的原因之一。

<sup>92</sup>老鬼，《血與鐵》，頁 52、54。

<sup>93</sup>〈浙江省青年近年來對文學藝術的欣賞興趣有很大的轉移〉，《內部參考》，1957 年 12 月 26 日，頁 11。一九五〇年代的《內部參考》是一嚴密控制，僅僅流通於級別相當高的中共幹部之間的刊物。其內容是報憂不報喜。

<sup>94</sup>〈上海各劇場現代劇目上座率低〉，《內部參考》，1958 年 5 月 24 日，頁 13。

民間解讀與官方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歧異最大者，莫過於保爾與初戀情人冬妮婭的感情。他們的愛情，一直是許多青少年最喜歡的故事情節。官方所強調的是他們兩人分屬不同的階級，分手乃是必然。他們兩人最後一次相見時，保爾正賣命地修築鐵路，冬妮婭看到衣衫襤褸、一副營養不良的保爾，不禁驚訝保爾「混得如此糟」。保爾則反唇相譏冬妮婭變得如此的帶有資產階級的「酸臭」。這樣的言語交鋒也證明了兩人迥異的人生觀（或階級觀），從此分道揚鑣。自然有讀者會接受這種官方強調的階級觀點。但也有不少讀者，階級意識不夠，最令他們如醉如癡，心神嚮往的正是保爾與冬妮婭的戀情，對於他們不能結為神仙美眷，感到萬分惋惜。<sup>95</sup>這樣的迷戀在文革時期更為明顯。當時官方特別強調的是不斷革命，清心禁慾；文學禁止描寫男女之情，電影也從來不會出現可能導致男女產生愛情的情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文革期間少數能夠公開出版的外國文學之一，保爾與冬妮婭的戀情，對於許多正值青春期的青少年來說，正好提供他們在精神上可以宣洩與愛慕的管道。

當時許多青少年記得的不是官方宣傳的階級愛情觀，而是冬妮婭那迷人的大眼睛與笑容，她的小資產階級氣質。因推出搜狐網站，成為當今大陸首富之一的張朝陽，回憶他在七〇年代擔任紅小兵時，對冬妮婭的印象最深，覺得她所有的一切，對於當時在物質與精神生活都赤貧的中國小孩而言，冬妮婭彷彿來自童話世界。這也是他第一次

---

<sup>95</sup>淳亮，〈《鋼鐵》——那燃燒著的真實人生〉<http://www.3stonebook.com/ts/t19.htm>；作者不詳，〈《莽昆侖》文學藝術欣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http://www.gs.cninfo.net>。

在書裡接觸到關於男女的描述。<sup>96</sup>文化評論家劉小楓也回憶到他一開始就喜歡冬妮婭。「她性格爽朗，性情溫厚，愛唸小說，有花香之質；烏黑粗大的辮子，苗條嬌小的身材，穿上一襲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個具體的輕盈、透明的美人形象。」冬妮婭代表的是當時不被允許存在的個人主義。<sup>97</sup>當然這種沒有站穩階級立場的解讀，在五、六〇年代是不可能公開表述，這幾年拜網路文章盛行之賜，不少類似的解讀方才陸續出現。

## 六、保爾精神與英雄中國化

一九五〇年代，在眾多進口的蘇聯英雄中，也摻雜有幾位本土英雄。最早也是中共力捧的有兩位：劉胡蘭和董存瑞。劉胡蘭十四歲即成為中共候補黨員（那時尚無共青團），十五歲為閻錫山軍隊逮捕，從容就死。毛澤東曾經特別為她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她的小傳在一九五一年夏天就出版，也是青年團鼓吹的必讀刊物之一。<sup>98</sup>董存瑞在十六歲即加入解放軍，十九歲因為捨身炸碉堡而犧牲。他的一生也被寫成故事書出版，廣為流傳。<sup>99</sup>還有一位別號「中國保爾·柯察金」的吳運鐸，一九三九年五月加入共產黨。抗戰時，因要取出雷

---

<sup>96</sup> 〈暗戀冬妮婭〉 <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5.htm> (2000/11/17)。

<sup>97</sup> 劉小楓，〈記戀冬妮婭〉，《讀書》1996.1: 85；劉小楓，〈冬妮婭的中國情節〉，（中構網）<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10.htm> (2000/11/17)。

<sup>98</sup> 劉胡蘭，山西人，生於一九三二年，死於一九四七年。梁星，《劉胡蘭小傳》（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1年第1版；1952年第3版）。

<sup>99</sup> 董存瑞，河北人，生於一九二九年，死於一九四八年。丁洪、趙寰、董小華，《真正的戰士：董存瑞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4）。

管的炸藥（拆信管），左手炸掉四個手指，且炸瞎左眼。國共內戰他再度負傷。吳運鐸雖然身體殘廢，仍然認真堅守工作崗位，努力不懈。他自己也承認受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影響很大。中共不但大量發行吳運鐸寫的《把一切獻給黨》，<sup>100</sup>還仿效《鋼鐵》一書，將他的事蹟描繪成十六圖的連環畫。<sup>101</sup>

生於一九一五年的吳運鐸，到了文革前夕，已經將近五十歲，拿來當全國的英雄模範，年齡顯得太大。全國的革命英雄典型必須年輕，而且最好已經不在人世。人年紀越大，行為舉止越容易流露出各種人性弱點，也就不太適合擔任完美的革命英雄模範。其次，如果英雄模範人還健在，對中共要求「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就會存有種種潛在的危險，難保哪一天做出違反官方標準的事來。所以，最好找個涉世未深，易於「塑造」的青年「烈士」，當革命英雄典型。孤兒出身又早死的雷鋒就是最好的「可造之才」。<sup>102</sup>以他作為新的全國性中國英雄典型，最適合不過。一九六三年三月中共發起大規模的全國性學習雷鋒運動。共青團中央呼籲青少年學習雷鋒的：(1)忠於黨，忠於無產階級立場；(2)做一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3)關心同志，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風格；(4)勇於克服困難

---

<sup>100</sup>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北京：工人出版社，1953年第1版；1957年第3版）。

<sup>101</sup>潘力模畫，〈中國的保爾·柯察金——兵工功臣吳運鐸〉（上）、（下）《中國青年》79（1951/11/24）、80（1951/12/08），封底連環畫。根據新華社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稿編繪。最後一圖示他讀《鋼鐵》書，反覆唸著：「我只要求給我留下一點能夠維持生命的東西，一顆心臟和一葉肺，我還要堅強地鬥爭下去。」

<sup>102</sup>雷鋒，湖南人，生於一九三九年，一九六二年死於一場倒車的意外。

的意志，艱苦樸素的作風；(5)堅持又紅又專，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sup>103</sup>

繼雷鋒之後，又有學習解放軍戰士王杰、歐陽海等運動。官方均為他們出版了書籍。<sup>104</sup>所強調的共同特質是，他們都聽毛主席的話，願意接受組織分配的任何工作，樂於從事任何微小的善行。<sup>105</sup>基本上，歐陽海、王杰的英雄典型，就是雷鋒精神的重複。他們的做人處事幾乎接近完美，難有可議之處，正是所謂「高、大、全」的英雄。這些六〇年代官方所推出的英雄，與中共建國前後的舊英雄有很大的不同之處，那就是對毛澤東個人的歌頌與崇拜。

一九六四年，中國青年出版社編印了《青年英雄故事》一書，介紹的十三位中國青年英雄（3位女性），全已過世。九位是戰死或為敵人逮捕而死，一位是參加韓戰時，為救一小孩而死，剩下三位則是因公殉職。他們的年齡從十五歲到二十八歲不等。<sup>106</sup>這些「舊」英雄（他們的英雄事蹟都發生在四、五〇年代，李賁死得最晚——1959年）與一九六〇年代的「新」英雄有一點顯著不同——他們沒有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其中有兩人想要效法的對象是蘇聯英雄丹娘（丁佑君）與馬特洛索夫（黃繼光），而不是毛澤東。相比對照之下，雷鋒和王杰則將自己所有的

<sup>103</sup> 〈共青團中央關於在全國青少年中廣泛開展“學習雷鋒”的教育活動的通告〉，《中國青年》5-6(1963):9。《中國青年》這一期是學習雷鋒的專輯。

<sup>104</sup> 《雷鋒日記選》（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78）；《王杰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金敬邁，《歐陽海之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6）。

<sup>105</sup> Mary Sheridan, “The Emulation of Heroes,” *The China Quarterly* 33 (1968/01-03): 47-72.

<sup>106</sup> 這些英雄是劉胡蘭、董存瑞、王孝和、丁佑君、楊根思、羅盛教、杜鳳瑞、龍均爵、向秀麗、李賁、黃繼光、丘少云、安業民。中國青年出版社編，《青年英雄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64）。

事蹟與行爲全都歸功於毛主席的教導，並將毛的思想運用於日常生活。而在中國新版本的保爾《歐陽海之歌》一書中，作者金敬邁認為歐陽海天生具有階級意識，且對革命事業有無私奉獻的精神，但仍不足以為英雄。他特別強調的是英雄的成長在於不斷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必須能看出來毛的思想在歐陽海身上產生巨大威力，才算是真正的英雄。<sup>107</sup>金敬邁的觀點十足反映出當時中共當局對英雄的新定義。

相較於中國英雄的「高大全」，保爾個性的不完美，反而讓人感到比較真實。他的脾氣暴躁，有時還會說粗話，不守紀律。<sup>108</sup>他成為政治人是有一個成長的過程，從內心的衝突、矛盾、鬥爭，磨練而成革命英雄。一般而言，蘇聯的英雄都有一段從無政治意識到有政治意識的成長過程。<sup>109</sup>比較之下，中國英雄不是這個成長過程極短，就是根本沒有，成了天生具有政治意識、富有階級鬥爭觀念的英雄，沒有任何思想上的衝突與轉折。中共比蘇共更重視血統論、出身論。這樣的意識形態使得中國的英雄更沒有轉折變化可言。中國英雄都是有骨無肉，澀而無味，更為禁慾，人物平面化，沒有個性，毫無脾氣。他們似乎都成了被捏出來的泥人，沒有生命，只有教條。生活中只有黨與革命，更沒有男女之情。這就像中國傳統的京劇一般，正反面的樣

---

<sup>107</sup>金敬邁，〈《歐陽海之歌》的醞釀和創作〉，《人民日報》，1966年3月1日，第6版。

<sup>108</sup>保爾想轉到騎兵第一軍時，被政治指導員斥為蔑視紀律，帶點無政府主義的味道。保爾承認指導員說的都對，但還是決定轉過去。而他用「奔放的感情去生活」，也被視為是不守紀律的缺點。有時按耐不住脾氣時，保爾會打人，雖然他也承認自己常常用拳頭代替頭腦。《鋼鐵是怎樣煉成的》(2000)，頁178-179、210、395。

<sup>109</sup>Katerina Clark, *The Soviet Novel: History as Rit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1).

版人物，都臉譜化。只有好壞兩極；好人一路好下去，壞人一路壞到底。他們沒有內心衝突，沒有善惡之爭。難怪蘇聯人觀賞中國製作的五〇年代電影時，紛紛離席。他們說電影內容是政治正確，但十分枯燥，看不下去。看完之後，連一個可以記住的人物或情節都沒有。<sup>110</sup>而有許多中國人觀賞蘇聯電影，則看不慣電影中的戀愛鏡頭，有些人乾脆閉上眼睛，他們因此認為蘇聯電影也是黃色電影。<sup>111</sup>其實，史大林時期的電影比起當時歐美所拍攝的電影，對於男女之情的表露，已經十分節制。中國觀眾會有這樣的反應，是否意味著中國人比蘇聯人還禁慾？這是否也因為中國文化要比俄國文化更壓抑個人情感的流露，更強調大我的存在？這些都是值得玩味與進一步探討的議題。

## 七、改革開放後的變調英雄曲

文革之後的中國大陸，老百姓已經厭倦於政治運動與思想掛帥，加上市場經濟的導向，人民價值觀丕變。過去官方所強調的集體主義與黨國優先的觀念，漸漸為個人主義和物質第一的觀念所取代。人民對於資訊的吸收不像建國初期與文革時期那樣，完全由國家控制。既然人民能從多種管道得知不同的訊息，即使國家仍然試圖壟斷一切事物的詮釋權，實則收效甚微。雖然在官方出版品仍然可以看到提倡效法革命英雄典型，以對抗日益嚴重的「西方精神污染」。但是中共所

---

<sup>110</sup>一九五六年於莫斯科放映的電影是《怒海輕騎》、《為了和平》。〈在莫斯科本屆中國電影週中 中國電影賣座情況極壞〉，《內部參考》，1956年10月10日，頁867-868。

<sup>111</sup>〈上海市「中蘇友好月」限於僵局〉，《內部參考》，1952年11月24日，頁295-296。

做的一切努力，在在顯示這些革命英雄典型已是到了強弩之末，日薄西山之勢。

中共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初期，政治上的鬆綁與不同資訊的取得，比較有限，因此《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高居官方排行榜，並且受到相當數量民眾的歡迎，並不足為奇。一九八二年，遼寧共青團在團幹部和團員間舉行「薦書有獎」活動中，前五名的推薦書目，包括《鋼鐵是怎樣煉成的》。<sup>112</sup>甚至到一九八九年，共青團團中央選出十本「人生路標」暢銷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名列第一。但是到了九〇年代，該書雖然仍舊在官方排行榜居高不下，<sup>113</sup>但這多少與中共官方的促銷與刻意宣傳有關。事實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九〇年代，特別在一般青年心目中，排行已經大幅滑落。證明之一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在上海高校做過讀書調查，《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名列前茅。但是到一九九七年再做讀書調查，其中最受歡迎的十七本書，有中國四大古典文學名著，《飄》、《簡愛》、《悲慘世界》等等，《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卻榜上無名。<sup>114</sup>

一九九〇年代，即使中共仍然箝制言論表達自由，大陸各界出現

<sup>112</sup>《遼寧青年》11 (1982/06): 24。

<sup>113</sup>例如一九九八年，根據大陸圖書市場的統計數字，這本書名列暢銷書排行榜第五位。一九九九年，以《光明日報》為首的多家媒體，評其為「感動共和國的五十本書」之首。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收入戴錦華編，《書寫文化英雄——世紀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蘇人民文化出版社，2000），頁198。

<sup>114</sup>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2 (1998): 69；〈上海四所大學讀書調查——名著最喜愛 《紅樓》居榜首〉，《重慶晚報》，1997年11月27日，第3版。

眾聲喧嘩的現象，則越來越熱鬧。一九九五年，第六代導演路學長開始自編自導他的處女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sup>115</sup>劇情始於成長於七、八〇年代的男主角周青，偶然撿到一本殘缺不全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的連環畫，他便以保爾自居，並以書中的朱赫來（保爾的政治啓蒙導師）為其偶像。影片的結局則是男主角懷抱著五〇年代的理想主義，面對九〇年代的現實環境，造成他的迷惘與游離心態。<sup>116</sup>路學長特別說明這種感受：「我們這一代人處在一種很尷尬的位置……我們是夾在兩撥人之間的一代……我們今天所處的現實，與我們過去所受的教育打架。」<sup>117</sup>這已經反映出信仰危機；舊的信仰已崩解，新的卻還沒有找到。<sup>118</sup>很可能由於這部電影的結局過於灰色、悲觀，幾乎等於完全否定官方仍然想極力挽回的革命英雄形象，電影因此經過三年的大修改，甚且將片名改為《長大成人》，方准於一九九七年底在大陸上映。

一九九七年秋天，一群前衛、時髦的大陸青年，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這本經典革命小說編成話劇上演。他們的童年是在保爾的小說、電影、漫畫書中度過的。他們想念保爾，儘管他們知道已經不可能再像保爾那樣生活了。導演蔡尚君說他演劇的目的在於提醒大家：「曾經有人那麼認真地生活過。至少我希望我的靈魂像我的帽子，離

---

<sup>115</sup>路學長，一九六四年生，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

<sup>116</sup>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頁199-201。

<sup>117</sup>路學長，〈三十歲對四十歲說——關於《長大成人》的對話〉，《中國青年》，1(1998): 62。

<sup>118</sup>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頁201。

我不遠。」製作人張揚則在回首自己過去將近三十年的歲月，卻發現自己的青春是沒有顏色的，無法在未來生活中找到支撐點。偶然之間，他發現了保爾，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什麼。導演堅決否認「懷舊之說」，他強調想要給今天的青年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最讚賞的東西。他要呈現的保爾是超越意識形態，具有人的高尚尊嚴，為生存與生命的意義呈現出一種積極的範例。<sup>119</sup>這齣話劇於一九九八年元月初在北京兒童藝術劇場上演。雖然新聞媒體大力宣傳這齣戲的轟動與賣座，實則不然。話劇勉強拖到二月下旬，終因票房慘澹，被迫停演。<sup>120</sup>

耐人尋味的是，就在話劇演出失敗之際，深圳一家萬科文化傳播（私人）公司選擇了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計畫籌拍一部大型電視連續劇，作為中共建國五十週年的獻禮。不久，深圳市委宣傳部和中央電視台也參與製作這部連續劇，並分擔資金。一九九九年二月該劇在烏克蘭開拍，總導演韓剛。編劇梁曉聲並出版了《重塑保爾·柯察金》一書。他們決定以保爾的感情生活為連續劇的主軸。<sup>121</sup>並於二〇〇〇年二月開始放映。根據非官方的抽樣調查，沒看過這部戲的初中生佔 60%，高中生則高達 73.8%。有幾名看過的學生表示，如果不

<sup>119</sup> 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頁 202-203；趙彩婧，〈今天，我們還能「消化」保爾嗎？〉，《中國青年》4 (1998): 58-59。

<sup>120</sup> 〈保爾是英雄還是叛逆？〉 <http://www.zhongo.com> (1998)；兩年後，《中國青年》雜誌總編十分委婉的道出實情，謂該戲「反響似乎不太熱烈」。彭波，〈誰更需要保爾？〉卻對電視連續劇的反響，認為新一代青年完全可以消化保爾。 <http://www.zhongo.com> (2000)。

<sup>121</sup> 梁曉聲，《重塑保爾·柯察金》（北京：百花出版社，1999）。雖然導演與編劇在拍製過程中屢為劇本內容與修改，發生爭執，但以愛情為主軸的觀點並沒有改變。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頁 203，註 2。

是老師要求他們寫觀後感，他們根本不會看。看過原著的學生更是寥寥無幾。許多中學生根本不知道保爾是誰，反而對同時段播出的港劇《楊貴妃》津津樂道。<sup>122</sup>結果，不出所料，看這部戲最多的是中年人，他們大多抱著懷舊的心理觀賞，畢竟保爾曾經陪伴他們一起走過青春歲月。但他們之中也有許多人對於連續劇以保爾與冬妮婭的愛情為主戲，而將階級鬥爭、殘酷的戰鬥、戰士的成長作為輔戲，非常不以為然，認為這違反了原著的精神。<sup>123</sup>

從路學長的電影到連續劇的製作，保爾精神是否應該繼續存在，引起廣泛的討論。拜網路盛行之賜，使我們在官方說法之外，可以看到更多民間的真正想法。贊成保爾精神者多是一些中老年人，他們認為保爾的一生體現了人生的真正意義，是革命人生觀最完美的體現。<sup>124</sup>保爾的形象是值得肯定的。他的真誠、忘我，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執著與奉獻，對滅頂之災的頑強抵抗，所顯現的不只是一個革命戰士的優秀品質，也是一切階級的英雄特質。<sup>125</sup>有些人以為，保爾的革命戰鬥精神，在今天或許已經不合時宜，但他追求生命意義的精神，仍有現實的迫切意義。這是種面對現實的「憂患意識」。市場經濟的影響，已使許多中國人精神失落，隨波逐流。今天的保爾，「啟發和鼓舞人們反思歷史，展望未來，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念，攀登更高的人生境界。」<sup>126</sup>這樣的看法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很難引起共

<sup>122</sup>〈「保爾」是昨天的英雄？〉，<http://www.zhongo.com> (2000)。

<sup>123</sup>〈不該這樣重塑〉，<http://www.zhongo.com/theme/gangtie/pinglun-09.htm>。

<sup>124</sup>任光宣，〈重讀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俄羅斯文藝》2 (1998): 60。

<sup>125</sup>杜林，〈走進去 跳出來：我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俄羅斯文藝》1 (1999): 77-78。

<sup>126</sup>吳俊忠，〈我們是否還需要「保爾精神」？〉，《俄羅斯文藝》3 (2000): 10-12。

鳴。即使贊同保爾精神的青年，談到要效法的也不是他為革命犧牲奉獻的精神或堅守共產主義理想，而是要學習保爾鋼鐵般的意志，克服障礙，超越自我。<sup>127</sup>這樣沒有革命精神的解讀保爾，其實在八〇年代初期的青年已有反映。<sup>128</sup>

反對保爾精神最力者，是那些覺得青春受騙的中年人。基本上他們認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表現出極左思想與史大林路線。這本書能讓人喪失獨立思考、正常戀愛、正常交友做人的能力。即使保爾精神仍然發光，那也只是餘光，終將熄滅。<sup>129</sup>他們也坦白承認，小時候喜歡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因為當時可看的書很少，能理解的書更少，淨挑故事型的書看。如今回首前塵往事，認為自己曾為這本宣傳、說教意味濃厚的小說著迷，真覺得自己傻。進而責備自己的祖、父輩的中國人，「沒有理性，沒有寬容，沒有文明，沒有愛。」只想將後代培養成合格的政治動物，為那所謂革命理想，拼命鼓勵人當革命英雄。但即使當了英雄，卻發現世界如此冰冷，物質與精神都極端匱乏，只剩下鬥爭和仇恨，這種理想不要也罷。現在卻又要鼓吹小孩學習保爾，等於是繼續培養小孩的愚昧。父母這種懷舊情緒，是把受

<sup>127</sup>劉亞樂，〈給胡金梅老師的一封信〉；劉書琴（全國勞動模範），〈在工作中體驗保爾〉。<http://www.zuowen.com> (2000.5.21)。

<sup>128</sup>讀者謝海增，（河南省新密技校八〇屆電修班）的回應：他被主人公「酷愛生活、頑強奮鬥的精神」所感動。每當遇到困難時，該書給了作者勇氣和力量。要學習保爾「那樣熱愛生活，不畏艱難地進行工作和生活，對未來充滿必勝的信念。」謝海增，〈烈火煉真金——《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讀後〉，《遼寧青年》11 (1982/06): 25。

<sup>129</sup>余一中，〈《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2 (1998): 63-69；余一中，〈再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是一本好書嗎？〉，《俄羅斯文藝》3 (2000): 20-25；董健，〈「保爾熱」下冷思考〉，《俄羅斯文藝》3 (2000): 13-15、25。

騙荒廢的青春當作珍寶。<sup>130</sup>

事實上，今日的大陸學生覺得保爾那個時代已經離他們十分遙遠。大學輔導員要求大學生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連續劇，學生反而對體育台的足球賽更感興趣。中學生更不明白保爾吃了那麼多苦，是爲了什麼？蘇聯已經解體，保爾的革命理想還是沒有實現，他的苦不是都白吃了？<sup>131</sup>這樣的反問真是道盡了五、六〇年代那些堅守保爾精神，一心爲黨爲國，卻受盡各種政治運動折磨者無盡的悲哀。今日絕大多數學生崇拜的英雄已經不是保爾，而是比爾·蓋茨(Bill Gates)。<sup>132</sup>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的價值觀念與崇美觀念的影響下，多數青年對英雄有新的定義：英雄等於成功者。這類新英雄不再是刻苦耐勞，或願意作社會螺絲釘，卻孑然一身的人；他們必須是財富傲世或有社會地位的人。

九〇年代以來的中國大陸，除了北京當局仍高舉共產主義的大旗，對於保爾的英雄典型及精神，尙在做最後逆流而上的搏鬥之外，今日大陸青年對《鋼鐵》的評價，實則已急速滑落。加上自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蘇共的崩解，《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幾乎在俄國完全銷聲匿跡。今天走訪莫斯科奧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館的中國人遠比俄國人多，而這些拜訪的中國人之中，恐怕追悼他們逝去青春的人多於要效法保爾精神的人。

<sup>130</sup> 〈鋼鐵咋這樣煉成了？〉，<http://www.zhonggo.com> (2000)。

<sup>131</sup> 杜致萬，〈網上對話錄——關於保爾和比爾·蓋茨〉，《俄羅斯文藝》3 (2000): 16-19、33。

<sup>132</sup> 于洪梅，〈解讀我們時代的精神徵候——對電視連續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接受反饋的思考〉，頁 216-219。

## 八、結論

奧斯特洛夫斯基沒有受過什麼文藝寫作訓練，他的小說技巧為純文學工作者所蔑視。他也從來沒有期望人們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視為一流的文學作品。但小說頌揚蘇聯內戰時期與敵人鬥爭的精神、堅忍不拔的意志、對黨的忠貞，正是當時史大林政權所要提倡的英雄榜樣。這樣的精神也正是他被引進中國的主要原因。中共為了激勵人民的愛國情緒，抵抗強權侵略；為了鼓勵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能夠在艱困的戰爭生活中，堅持下去；保爾為革命、為共產黨，義無反顧的犧牲奉獻精神，正是最好的模範。

自抗戰以來，中共大量譯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一書，並透過電影、話劇、教科書、成立保爾班等各種管道，宣揚保爾精神，加上共青團的配合，期望將中國大陸的青少年塑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同時保爾精神的內涵，也由於政治環境的改變，官方所強調的重點也有所不同：從韓戰的愛國精神、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不畏艱辛、到文革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一般而言，到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官方與民間對保爾精神的解讀有很大程度的交集，這或許也可以說明是官方宣傳成功之處。但是民間的解讀《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不一定完全隨著中共官方的指揮棒起舞。其間解讀的最大歧異在於冬妮婭和保爾之間的愛情。從官方、民間解讀之異同，可以看出國家（生產者）與社會大眾（消費者）是種協商(negotiated)關係，不是截然二分，並非國家在控制一切，而民間只有消極被動的接受；反之亦然。所謂中共上層以菁英的身份來塑造大眾文化，頗有商榷的餘地。因為即使最初是由上層菁英推動塑造保爾英雄典型，但是民間的呼應之中，並非完全

迎合官方的解讀（即使他們同意官方的解讀也未必完全是被迫的），他們甚且還加入自己的解讀，來參與塑造這個文化的過程。因此在「保爾精神」的產品上市之後，就很難說這樣的大眾文化就是屬於菁英（或上層）文化。換言之，這整個文化生產其實是種多元參與的過程，不管民間與官方對保爾精神解讀的異與同，都已經是這整個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不能說其中只有菁英（或製造者）才是主角。這個案例展現了法蘭克福學派與 John Fiske 對大眾文化的看法呈現兩極的詮釋，並不足以說明實情。<sup>133</sup>

中共建國初期，百廢待興，一時無暇自創本土的社會主義英雄模範，因此進口的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方有機會在中國的政治文化舞台大顯身手。到了六〇年代，由於中蘇關係破裂與因應中國國情的需要，開始出現全國性的中國社會主義英雄。中蘇英雄特質的不同，所反映出中蘇兩國文化的差異，是個引人深思、非常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不過，自從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隨著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的改變，中蘇社會主義英雄所強調的革命、鬥爭精神，已經逐漸為今日大陸青年所摒棄。平心而論，若除掉意識形態，《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還是一本能夠鼓舞人在逆境中不要放棄希望、勇敢地面對命運挑戰的好書。但是，很可能由於中共大力宣傳保爾精神的結果，人們對《鋼鐵》一書內容及其所帶來的政治聯想，已有定見，很難再將其視為單純的勵志作品。

---

<sup>133</sup>還有必須一提的是，本文所提到的民間解讀，其實是以城市居民為主。由於資料的限制，幾乎沒有廣大農民回應保爾英雄典型的文字資料。若以這個角度來看，所謂的大眾文化或全民文化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代表了人民，實有再探討的必要。

保爾的英雄典型，從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到鋼鐵是怎樣爛掉的，可以看到的中國大陸因為政治、經濟因素的改變，由單一價值觀，逐漸轉向多元價值觀的社會。革命與階級鬥爭的訴求已失人心。即使當今中共當局大聲疾呼應該效法保爾精神，但這也是餘光反照，革命英雄已經無力可回天。

## A Soviet Hero, Pavel Korchagin, Comes to China

Miin-ling Y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uses the hero, Pavel/Paul Korchagin, of a Soviet novel,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written by Nikolai Ostrovskii, as a case study to explore his role played 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society in Mainland China, mainly from 1949 to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the novel P. Korchagin's performance during the civil war in Russia demonstrating the fighting spirit against the enemies, steel-like will, and loyalty to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the ideal-type revolutionary hero in Stalin's regime. It is exactly for the same reason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roduced the Soviet hero to China.

For Mao Zedong, revolution does not only mean the transfer of political power,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reform the society. After seizing power in 1949, Mao Zedong was eagerly to uproot the old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elite culture and to establish new socialist culture and new mass culture. How to mold "new socialist men" and to establish new socialist values became an urgent task to tackle. P. Korchagin's heroic image and features offer the best example for making new men and new mass culture. Since 1950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massively

translated different editions of the novel to meet the need of different readers' level. It also utilized various channels, such as movie, drama, textbooks, founding the classes of Paul in schools, and the coordination work by the Communist Youth, to publicize Paul's spirit in order to make the youth become socialist new men.

However, the authorities emphasized the contents of Paul's spirit differently in accordance with different political climates: the patriotism during the Korean War, the steel will and hardworking during the so-called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construction, and the class struggle and the proletarian dictatorship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aul's spirit" by the authorities were not necessarily coincided with the people's interpret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before Mainland China entered the stage of reform, initiated by Deng Xiaoping, there were large portions of overlap between the two.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sides appears in their interpretations on the love of Paul and Tonya. From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by the party authorities and the people indicate that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cultural producer (the state) and the cultural consumers (the people) are negotiated. It is not that the state can totally control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cultural product (Paul's spirit) and people can only passively accept the state's interpretation, or vice versa. In other words, the proces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s the process of multi-participation. No matter for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the interpretations by the authorities and by the masses, all of them has become part of the mass culture. One cannot simply state that only the elite (or the producer) is the major figure of making mass culture. This case study, presented by P. Korchagin's revolutionary ideal hero, clearly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lar interpretations on mass culture by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John Fiske do not reflect the historical reality.

**Keywords: molding hero, Paul's spirit, How the steel was tempered,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CCP, mass culture**